

《克罗茨纳赫笔记》的历史学研究 及其思想史意义

邓安琪 卜祥记

摘要 对马克思《克罗茨纳赫笔记》这一早期文本,国内外学界并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在既有的研究中也存在着过分拔高或贬低其思想史地位两种倾向。从马克思早期思想的转变这一思想史课题出发,我们应该看到:不能过高估计《克罗茨纳赫笔记》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中的地位,但这绝不意味着可以忽视这一早期文本在马克思思想转变历程中的重要作用。《克罗茨纳赫笔记》的历史学研究本质上从属于马克思对“市民社会和国家关系问题”的考察,并因此蕴含着马克思哲学唯物主义立场转变的基因。同时,这一研究促使了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体系中关于国家和法律问题的立场的批判与质疑,并逐渐发现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历史真相,从而为向共产主义政治立场的转变奠定了思想基础。对这一历史学文本及其思想史意义的研究,应当被看作考察马克思早期思想转变历程、弥合所谓“青年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断裂的重要一环。此外,这一笔记也表明,马克思早期思想的转变并非简单的是费尔巴哈哲学外部影响的结果。

关键词 《克罗茨纳赫笔记》;哲学批判;政治立场;马克思早期思想

中图分类号 A1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19)06-0061-07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3BZX009)

完成于1843年7-8月的《克罗茨纳赫笔记》(以下简称《笔记》),是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历史学文本。这一以法国大革命为中心的历史学研究不是马克思偶然的理论兴趣,而是具有其必然的思想导因:一方面,《莱茵报》时期的“物质利益的困惑”已经促使马克思开始关注“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这一现代性进程中的核心问题;另一方面,黑格尔思辨理性哲学在这一问题上并没有提供令马克思完全信服的看法,相反,其隐晦的国家观和思辨哲学体系在社会现实面前表现出不可回避的自我悖论。对市民社会和国家关系问题的进一步研究,以及由此而展开的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批判诉求,成为当时还是青年黑格尔派一分子的马克思思想转变的核心内驱力。

我们发现,近年来国内外学界对《笔记》的关注主要来源于一个思想史的核心问题,即在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整个历程中,如何确立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地位。在这一问题上存在着一种“断裂论”的说法,即马克思思想发展历程中存在着“青年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的划分,并且二者之间存在某种思想的断裂。由于对“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之间关系的不同理解,学界关于《笔记》思想地位的界定呈现出两种趋势:一种观点认为,《笔记》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在这一笔记中“马克思已经开始自觉地运用唯物主义,把它作为研究历史进程的方法”^[1](P171)。在这里,通过大量的历史学研究,马克思已经基本确立了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一致的“历史社会形态论”^[1](P168-171)。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对马克思这一文本不应估计过高,更不能说马克思在这里已经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思想进程。因为,比之于同

期的其他也转到唯物主义立场的青年黑格尔派先锋分子来说,此时马克思的观点并非是最深刻的。马克思第一次思想变革中的政治立场层面的转换也并非是最轻易实现的。因为只是在后来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才从民主主义彻底转到无产阶级立场^[2](P30-34)。事实上,对《笔记》本身思想史意义的不同看法,与将“青年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划分开来并确立其间存在某种思想的断裂内在关联。要破解这种断裂,我们必须植根于马克思思想史行程的完整理论空间中,从其唯物史观的起源、发展及全面展开的理论延续中本质性地呈现出马克思研究话题的内在贯通。由此出发,我们将发现《笔记》历史学研究真正的思想史意义。

总体来看,《笔记》的主要内容聚焦的是以法国为中心的欧洲部分国家自身封建社会的历史演变问题。同时,受自身思想困惑带来的研究初衷影响,在这一庞大历史叙事中,马克思主要关注的是财产关系、政治形式与法、国家制度等一系列问题,即它聚焦的问题在于新旧国家变革中复杂政治机制的转变。然而,正是在这一研究初衷的深层逻辑中,蕴含了马克思对国家与法的存在根基以及历史变革的根本动因——以财产关系为核心的物质利益的发现。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发现预示着马克思对由黑格尔思辨理性哲学所架构的唯心主义历史观进行批判,意味着马克思从青年黑格尔派自我意识哲学的泥潭跳出而开始转向唯物主义;也正是在这种历史实情的还原和哲学立场的初次转变中,马克思逐渐发现了资产阶级政治的真实面目,从而为他在不久之后向共产主义政治立场的转变充盈了思想基础。

一、“物质利益”的困惑:青年马克思写作《克罗茨纳赫笔记》的现实动因

1843年以前《莱茵报》时期的马克思,其主要的理论活动就是发表时事政论。就此时马克思的直接哲学立场来看,他虽然已经与以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哲学立场发生了决裂,但取而代之的依然是另一种理性意识,即“人民意识”,其整体性的哲学世界观依然没有跳出黑格尔哲学的理论基地。1842年1月,由于对普鲁士政府最新书报检查令的不满,马克思写作了《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马克思认为:出版自由真正代表着人民精神,是实现自由的前提;普鲁士王国反动的书报检查制度不仅侵犯了人民的自由,并且违背了国家和法的本性;普鲁士政府限制了广大人民的出版自由,却把它赋予政府当权者和书报检查官等少数人,这不是法律的平等,而是私人的特权,是对国家和法律之理性的践踏。理性的国家和法律在特权面前发生了自我矛盾。在这里,黑格尔理性哲学的基本立场和人民理性的哲学原则鲜明地体现出来。然而,同年10月前后,当马克思面对“林木盗窃法”最终被通过这一社会事实,并对此发表了《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时,马克思的黑格尔理性哲学立场开始遭遇到最初的挑战。换言之,当马克思更为深入地投身于现实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时,他接触到了现实的物质利益问题,从而在自身的思想发展进程中“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3](P588)。正是这一难事,成为马克思这一时期遭遇到的重大理论事件。同时,也正是在这一理论事件中,我们看到了马克思自身哲学立场发生的变化——以“人民理性”为代表的理性国家观与现实事实的冲突和对抗。这篇文章中,马克思开始直接讨论物质利益问题和国家、法律之间的关系,并察觉到物质利益与之前作为思想前提的理性国家、法律之间的冲突。

就其对“林木盗窃法”的直接批判而言,马克思采用的理论工具依然是黑格尔的理性国家观;但是,就其对“林木盗窃法”事实上被通过这一事件的困惑而言,它则意味着黑格尔的理性国家观是有问题的,这个问题在黑格尔理性哲学内部是不可化解的。因此,我们通常理解的马克思对物质利益的困惑实际上乃是对黑格尔理性哲学立场的困惑,是马克思此时哲学立场内部的自我反思。概言之,物质利益问题之所以使马克思感到困惑,并不在于物质利益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因为马克思此时只是面对而非真正进入这一问题;同时也不在于黑格尔的法哲学体系没有把此问题纳入讨论,其真正的原因在于:物质利益问题使得在马克思那里先行的单纯理性原则发生了动摇,它本质地与这一理性世界观发生了冲突由此带来这一理性世界观的难以自洽。这就是该时期马克思面临的巨大的思想矛盾,这一矛盾本质上可以被提

升为现实物质领域与理性国家,即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问题。对这一问题的澄清,直接地推动着马克思对等级利益、国家和法律关系以及与之相关的所有制等一系列问题进行历史研究。同时,这一研究在哲学上也是回答由黑格尔思辨理性立场所带来的矛盾问题的必然要求。不仅如此,马克思此时对理性国家的质疑,在政治立场上则直接地表现为对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目标的反思。针对普鲁士政府企图制定“林木盗窃法”来把农民捡拾枯枝的行为当作盗窃行为,马克思认为这与国家自由地对待一切成员的精神是相反的,它不是按照国家的理性普遍性来行动,而是国家的普遍利益降低为少数人的私利,林木所有者利用林木盗窃者的行为而盗窃了国家本身。以对人民的利益和自由负责的名义来展开自身普遍性的现代国家,在马克思这里开始发生裂痕。“《莱茵报》时期的实践经历与青年黑格尔运动中对国家问题的讨论促使马克思重新考虑黑格尔的国家问题”^[4](P15)。于是,当1843年1月《莱茵报》遭到查封,马克思于同年5-10月落脚于克罗茨纳赫时,便“退回书房”来认真反思过去的斗争经验。也正是这时,马克思开始了以法国大革命为中心的历史学研究以及对黑格尔法哲学和现代国家的抽象普遍性的批判,其理论成果就是《克罗茨纳赫笔记》。

二、历史学研究中的哲学政治学话语:《克罗茨纳赫笔记》的核心内容

《克罗茨纳赫笔记》这一历史学研究文本共确定为五册,内容非常丰富。在时间序列方面,它跨越了从公元前6世纪到19世纪30年代近2500年的长度;在地理空间方面,它辐射了对包括法国、英国、德国、瑞典、波兰等欧洲主要国家封建社会历史的考察;在文本直接显现的研究形式上,《笔记》则主要是关于这些历史学研究的文本摘录和少量的评述,马克思本人直接的观点和见解则相对较少。然而,笔记自身内容的庞杂性和主观表达的隐匿性并不是说马克思此时的研究是混乱无序的,相反,通过摘录的内容以及添加的“主题索引”和小标题可以知道,马克思对笔记做了专门的思考和整理。

从《笔记》全貌来看,其考察的历史序列是较为明晰的。苏联学者拉宾认为,通过对政治历史的深入研究并基于不同的“所有制形式”,马克思在笔记中已经实现了较为完整的社会历史形态的建构,即从古希腊罗马到中世纪,再到现代社会,最后是民主制的未来社会。虽然这一理论指认存在着过高估计马克思此时思想成熟度的嫌疑,但不可忽视的一点是:《笔记》中的历史研究已表露出马克思思想中关于历史谱系和分阶的总体架构。更为重要的是,在笔记整理的逐步深入中,马克思的这一架构和意识依循的是他不断发现的如下核心观念:财产所有制或私有财产状况的变化是包括政治活动、国家形式等社会历史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

(一)《克罗茨纳赫笔记》历史学研究中的哲学话语

从该研究呈现的理论方法上来看,认为《笔记》具有非常鲜明的哲学基底支撑似乎是不妥当的。这是因为,在这一笔记中马克思显现出与以往完全不同的研究面相。不管是“博士论文”时期还是《莱茵报》时期,马克思的理论研究都显露出活跃的哲学话语,从而对相关问题进行了直接的批判和解读。然而,在《笔记》中,这种活跃和直接的哲学话语立场却不太鲜明了,代之以大量篇幅的研究文本摘录和散落的评述。这是否意味着马克思此时哲学理论话语陷入无措的混乱或思想活动的消极状态?事实并非如此。当马克思带着“物质利益”困惑进入关于政治变革史的研究时,其一直以来的黑格尔式的理性哲学受到社会现实情境的冲击,但又尚未完全地陷入瓦解状态。正是由于处在这一思想的转弯处,马克思哲学话语自主表达的直接性和完整性就不再那么明显。事实上,马克思这一哲学话语的沉默恰恰表明其思想自我交战的发生,进而昭示着其哲学基本问题之重要转折的来临。同时,这一沉默也证明:马克思不久之后发生的哲学主张的鲜明转变并不是来自某一种外部观念的决定性牵引,它本质上是其自身这一历史学独立研究中所发生的自主思想活动的结果。实际上,这一哲学主张的转变在《笔记》的后半部分就逐步显现。

《笔记》中的第4册是整个文本中最值得关注的一部分,因为在这里,马克思几乎直白地道出了之

后其思想发展中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更重要的是,这一原则蕴含了马克思哲学基本立场的转变。在这里,马克思摘录了兰克的《历史政治杂志》,在读完其中关于“法国复辟时期”所有制关系的段落之后,马克思写了一段长长的批注,在话语转变的深层,他认识到政治机制转变的基础在于财产关系的变革。马克思发现,在法国的不同政治时期,国王与宪法的关系是相互颠倒的:“主语变为谓语,谓语变为主语,被决定者代替决定者”^[5](P368)。我们注意到,马克思在这里已经使用了“主谓语”这样具有鲜明的黑格尔思辨哲学色彩的术语,这与他在这一时期同时写作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形成呼应。实际上,马克思此时正发生着对黑格尔思辨理性哲学的深刻质疑。马克思接着批注:“当黑格尔把国家观念的因素变成主语,而把国家存在的旧形式变成谓语时——可是,在历史真实中,情况恰恰相反:国家观念总是国家存在的[旧]形式的谓语——他实际上只是道出了时代的共同精神,道出了时代的政治神学。”^[5](P368)思想的弯道在此凸显出来。这一重要的评述代表着马克思确认了历史沿革和社会形态转变的最基本原则,即物质利益形式决定了国家和法的形式,社会现实状况决定了观念的状况。这已不仅仅是单纯的历史叙事,它深刻地蕴含着马克思对新的哲学基本立场的确认。这进一步体现在他揭示出的这种“政治神学”所包含的哲学世界观的颠倒性质,即观念成为决定性的东西。“这样一来,一切非理性的形式也就变成了理性的形式。但是,原则上这里被当成决定性因素的在宗教方面是理性,在国家方面则是国家观念。这种形而上学是反动势力的形而上学的反映,对于反动势力来说,旧世界就是新世界观的真理。”^[5](P368-369)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的问题在于倒置了国家观念和国家存在的关系,革命过程的不断变化决定了宪法这一国家观念的代表发生变化,历史现实否定了黑格尔的国家认识,表现出与之截然相反的历史特点。这一结论促使马克思在思想深层发生方向性的变化。也就是说,马克思在这里通过对社会物质现实原则的把握,相对鲜明地跳出了黑格尔式思辨理性的唯心主义原则。当然,马克思这一哲学立场的转变携带着费尔巴哈哲学的因子,特别是受到费尔巴哈式的主谓颠倒方法的影响,这种转变的理论效应则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不断显露出来。

(二)《克罗茨纳赫笔记》历史学研究中的政治学话语

《笔记》对法国大革命这一主题表现出了很高的关注度,马克思在介绍大革命的著作中摘录了大量有关资产阶级利益同财产问题的联系的论述,认识到资产阶级陷入了私有财产的悖论之中:在宣称资产阶级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时候,并不认为封建财产是同样不可侵犯的。这些摘录反映出的马克思的思路是:资产阶级革命具有局限性,资产阶级的革命无法保证实行真正的普遍的平等,现实的平等是被财产所有者拥有的财产决定的。

《笔记》第1册,马克思摘录了格·亨利希的《法国历史》一书,主要关注了法国封建统治下议会的形成和发展,同时对司法制度、贵族制度、战争变动和国家机构等问题进行了研读。需要提及的是,马克思在这里察觉到了军事制度与财产制度之间的关系问题,并发现了市民阶层的兴起与不断扩大的工业和贸易在封建制度的衰落和近代资产阶级形成的过程中起到的作用。可以说,马克思在这里已逐渐认识到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但尚未有深入思考。在《笔记》的第2册,马克思已明显察觉到私有财产问题的顽固性,并就私有财产与政治制度的联系进行了评注。首先,马克思发现了“第三等级”这一现代社会形成和发展的主力军,认为他们是“依靠自己的勇敢和自己武器的力量,或者依靠用劳动获得的资金而得到的权利的承认”^[6](P49)。同时,马克思察觉到如此历史实情:第三等级在打碎了教会的财产后却丝毫不动摇其个体的私有财产。于是马克思在摘录路德维希的《最近五十年的历史》时做了如下评注:“没收教会财产之目的在于满足国家债权人以避免国家的破产”“这里有一个很大的矛盾:私有财产一方面被牺牲掉,另一方面却又不可冒犯”^[7](P85)。第三等级本身是要打破封建政权的压制,其中的主要力量——新兴资产阶级用“自由、平等、博爱”打开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空间。然而,资产阶级在实现了政权的变革之后,却表现出维护其自身利益的狭隘性,广大人民的利益被忽视,

新的剥削代替了旧的剥削。对第三等级的这一认识自然会影响到马克思先前在政治立场上确立的民主主义思想,因为在他原来的政治理想视域中,民主主义革命的目的并不是重新确立私有制。这一认识在《笔记》的其他地方进一步得到了确认。马克思发现:资产阶级议会仅仅是其本阶级利益的代表而并不顾及广大人民的利益,由此表达了如下观点:“每个人都有权利参加制定使他负有义务的法律,参加管理作为他自己事务的公共事务。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说人人权利平等,任何人都是公民,等等,就是虚假的。”^[6](P66)在这里,马克思看到了资产阶级的阶级目的及其统治形式的欺骗性。

可以看出,当马克思因眼前的社会现实状况感到困惑不解,从而从理性国家观中“抽象个人”的自由理性的目标转向对“现实个人”的直接物质利益关注的时候,他已经逐步认识到,黑格尔所理解的理性国家中的“个人”,不管是国王、资产者还是公民,都是以特殊利益为目标的抽象个人,即都是“私人”,只不过它们都穿上了现实普遍性的外衣。也正是此时,马克思原来那种革命民主主义政治立场出现了裂缝。在《笔记》的第5册,马克思考察了默瑟尔《爱国主义的幻想》中由于所有制不同而产生的关于自由的不同规定,并直接表达了如此观念:自由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这表明马克思此时已经把自由放在历史中来看待,自由的内在规定性伴随着不同社会制度的历史沿革而发生变化。正是在这里,我们再一次发现,马克思原先追求的民主主义的自由政治立场实际上发生了动摇。因为马克思在真实的历史情境中不断发现,资产阶级实际诉求的政治局面不是如它宣扬的那样。这一政治立场的内在转变构成了马克思思考人类社会未来理想制度的理论起点,并进而为其社会批判和共产主义理论奠定了最初的理论空间。

三、《克罗茨纳赫笔记》的思想史意义:马克思第一次思想转变的关键文本

马克思并非天生的历史唯物主义者,同一切人类思想史上的理论学说一样,其思想的成熟过程同样与他经历的社会现实条件及其进入前人思想的广度和深度相伴随。学界通常认为,马克思在自身哲学思想发展的历程中有两次重大的转变,其中的第一次转变就是从黑格尔思辨理性的唯心主义转向一般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我们认为,正是在马克思的第一次思想转变进程中,《克罗茨纳赫笔记》的历史学研究成为一个关键的逻辑环节。

《笔记》在丰富的史料基础上进行各国历史的比较,进而在历史比较中找到历史进程的一般趋势或规律。马克思正是在得到关于历史规律的认识这一基础上,才得以实现向唯物主义哲学立场的转变。正如苏联学者所说:“他的这种理解同他自觉地向一般哲学的唯物主义立场的转变是同时完成的。”^[8](P74)如前所述,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的哲学立场总体上属于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哲学,其总体哲学逻辑仍是黑格尔的理性原则,关注的问题也主要是理性国家和政治的建构。当马克思遭遇到真切的社会“物质利益”问题时,这一理性主义的哲学原则便开始受到质疑,因而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展开的。然而,此时的马克思并不能完成对黑格尔庞大理性主义哲学的根基式批判,更不可能完成对这一哲学的超越,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马克思缺乏必要的历史事实和现实的有力研究证据。正是在此意义上,当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进行丰富庞大的历史学研究时,实际上他是在完成一种哲学唯物主义的推动。正是由于在《克罗茨纳赫笔记》中对欧洲国家的“政治—历史”进行了研究,马克思才能够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表现出与黑格尔相异的哲学立场,表达出与青年黑格尔派不同的政治话语。我们不能想象,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的如下观点是纯粹思想突变的结果:在黑格尔那里,“观念变成了主体,而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的关系被理解为观念的内在想像活动。家庭和市民社会都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活动着的;而在思辨的思维中这一切却是颠倒的”^[9](P10)。显然,马克思在这里聚焦的“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问题”已表露出与黑格尔的“思辨思维”明显形成立场反拨的唯物主义原则。然而,如果没有《笔记》对欧洲现实社会进行的历史学研究,这一转变是很难实现的。正是在这里,“马克思追述了黑格尔法哲学的根本问题是没有正确把握市民社会在历史中的真实情况,完全是为了理论论证而忽视了真实的历史过程,马克思通过历史研究逐渐地意识

到了所有制、市民社会、阶级、国家等概念的历史意义,走向了唯物史观,而起点似乎是从《克罗茨纳赫笔记》开始的”^[4](P140)。

哲学立场转变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政治立场的转变。同样是在《克罗茨纳赫笔记》的历史学研究中,马克思更为明显地发觉资产阶级利益的狭隘性和欺骗性。在对历史更迭规律的不断探索中,马克思开始认识到资产阶级的统治形式并不是完美的政治形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理想并不是完美的社会理想,因为它与以往的统治形式一样都是跟着特定的阶级利益在跑,并不能解决最广大人民真实的生活状况。在真切的历史发展研究中产生的这一对资产阶级真实面相的认识,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当时接触到的共产主义思想的发展,进而为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无产阶级政治立场的坚定和理论表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支援。这也是目前国内学者关于《克罗茨纳赫笔记》研究的一个重要路径,即通过考察《笔记》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之间的文本关联来探析《笔记》自身的思想史地位和影响。实际上,这两个文本之间存在着密切关联,它们都是马克思为了弄清国家问题而进行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所形成的研究成果。《笔记》最为本质的意义在于它是马克思开始转向唯物主义的标志,是制定历史唯物主义的真实开端,对转向共产主义具有推动作用。

同时,这一笔记也表明,马克思这一哲学思想的转变并非简单的是受费尔巴哈哲学影响的结果。马克思只有通过自己的研究以及对现实政治斗争的反思,自主地实现对黑格尔哲学的质疑,费尔巴哈才以同样对黑格尔思辨哲学批判的形象真正进入马克思的理论视野。一方面,马克思从费尔巴哈的主谓颠倒方法出发进行《克罗茨纳赫笔记》的历史研究,这一方法促使马克思回归到历史研究中来确证自己的思想成果;另一方面,马克思在写作《笔记》的过程中发现了所有制与国家法的真实关系,从而将费尔巴哈主谓颠倒方法引入社会历史领域,把费尔巴哈的实体性“物”解释为私有制,即一种社会经济关系,逐渐接近了历史唯物主义。这意味着,在某些局部环节上,马克思也已经初步意识到他与费尔巴哈的理论界限。

四、结语

如前所述,《克罗茨纳赫笔记》这一文本构成考察马克思早期思想转变的重要逻辑环节,它不仅是一部历史学研究笔记,更重要的在于它蕴含着马克思哲学世界观和政治立场转变的重大推动力。然而需要说明的是,对这一笔记的意义并不能过高地予以评价。因为,从总体上来看,《克罗茨纳赫笔记》并没有“完成”马克思哲学唯物主义立场的彻底变革,而更多的是一种思想转变的推动力量。与同一时期内交叉写作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相比,《克罗茨纳赫笔记》更多的是一个过渡性或补充性文本,它不是能决定马克思思想转变的完整性著作。从马克思在这一文本前后的思想变动来看,其思想的基本方向已然发生转向,且原因更多的与他遭遇到的现实物质利益问题、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影响、赫斯和恩格斯经济学研究的冲击相关联。这一思想的基本定向意味着《克罗茨纳赫笔记》的历史学研究在更大程度上起到一个思想催化剂的作用。此外,在政治立场的转变这一问题上,《克罗茨纳赫笔记》也并非决定性地影响了马克思,因为只有到之后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才实现了无产阶级政治立场的彻底转变。正是由此,我们不能同意前文提到的苏联学者拉宾对《克罗茨纳赫笔记》在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所做的评定。显然,拉宾过高地估计了《克罗茨纳赫笔记》的历史意义。

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忽视甚至贬低《克罗茨纳赫笔记》在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作用,这不仅是因为它蕴含着马克思这一时期哲学唯物主义和政治共产主义的萌芽,而且这一文本中对财产关系、土地制度等经济范畴的关注也已表露出马克思未来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迹象。同时,这一笔记的研究,也表示着马克思此时思想转变的内驱力更多的是其自身独立探索的结果,并不是处于费尔巴哈哲学的完全统摄之中。

参考文献

- [1] 拉宾. 马克思的青年时代. 南京大学外文系俄罗斯语言文学教研室翻译组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2.
- [2] 张一兵. 青年马克思的第一次思想转变与《克罗茨纳赫笔记》. 求是学刊, 1999, (3).
-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 [4] 王旭东, 姜海波. 马克思《克罗茨纳赫笔记》研究读本.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6.
-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2.
- [6] 中央编译局. 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11辑.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0.
- [7]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Exzerpte und Notizen 1843 Bis Januar 1845*. Berlin:Dietz Verlag Berlin, 1981.
- [8] 纳尔斯基, 波格丹诺夫, 约夫楚克. 十九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上. 金顺福, 贾泽林等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2.

The Historical Study on *Kreuznach Notebooks* and Its Ideological Significance

Deng Anqi, Bu Xiangji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bstract As one of the early texts written by Marx, *Kreuznach Notebooks* has not yet been fully recognized in the academic circles at home and abroad. In the existing research, there are two tendencies with either excessively high or excessively devalued opinions on this wor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Marx's early thoughts, we find it impossible to overestimate the position of *Kreuznach Notebooks* in the development of Marx's thoughts, but we should not ignore the important role of this early text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Marx's thoughts. The historical study on *Kreuznach Notebooks* is essentially subordinated to Marx's investigation of "civil society and state relations", thus containing the genes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Marx's materialist st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study has prompted Marx to criticize and question the position of Hegel's legal philosophy on national and legal issues, and gradually discovered the historical truth of bourgeois political emancipation, thus providing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his transition to the communist political position. The study of this historical text and its ideological significance should be regarded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investiga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Marx's early thoughts and bridging the so-called "Young Marx" and "Mature Marx". In addition, this work also shows that the transformation of Marx's early ideas was not simply the result of the external influence of Feuerbach's philosophy.

Key words *Kreuznach Notebooks*; philosophical criticism; political stand; Marx's early thoughts

-
- 收稿日期 2019-04-03
 - 作者简介 邓安琪, 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上海 200433。
卜祥记, 哲学博士, 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 责任编辑 涂文迁